

笔谈

王飞凌
陈健民
胡平
宋永毅
坚真光
李西潭
雷乐天
弥正平
王涵
邓聿文

中国民主季刊

第1卷 第4期
2023年10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中国民主化 会乱吗

编按：长期以来，一提到中国民主化，几乎总是有人问：“国家会乱吗？”，同时，官方也一直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官方媒体不时渲染其它转型或民主国家的“乱象”。

担心民主化会导致大的动荡、混乱，这是一种在社会各个阶层都存在的普遍情绪。尽管从来没有人清晰界定，但听起来似乎那种动荡混乱很可能是灾难性的、难以承受的。这种普遍担心的“大乱”究竟是什么？是经济崩溃，没有法律秩序的无政府状态，国家分裂、内战，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竞争，还是其他？

如何看待对中国民主化前景的这种普遍担忧？它主要是出自人们天生的保守倾向，即对未知之境的惶恐、不安，还是官方宣传潜移默化的影响？从其他国家的经验和中国自身的情况看，这种想象的恐惧有多大的合理性？中国民主转型究竟存在哪些风险？应以什么心态对待可能的震荡与风险？哪些风险是可以未雨绸缪、尽量避免的？如何减少转型过程的不确定性？

如何看待民主、专制与稳定的关系？目前中国语境中、特别是官方话语中的“稳定”存在哪些问题？中国目前是不是一个稳定的国家？如果您既有在中国、也有在自由社会生活的经历与观察，您如何看待自由社会与专制下的稳定？游行示威在中国是不允许的，上街抗议会被官方定性为“动乱”，其中体现的是什么稳定观？民主社会中对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多党竞争的接受与保护，体现的是什么稳定观？

就这些问题，我们邀请了专家学者与海外中国留学生进行笔谈。简短的评论当然不足以回答这么多而且重要的问题，我们欢迎专家学者赐稿做更深入、细致、全面的讨论。



王飞凌（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这是一个极富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话题。担忧社会动乱无序，是人之常情，也是人类之所以要建立政治制度和国家权力的第一原因。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征税与警察齐备，还是经常性地被所谓“大乱”所困扰，那就是该国政府无能、无道，缺乏执政合法性，连最基本的工作也没做好。在今年出版的《中国纪录：评估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书里，我分析了中国的政治治理。一个根本性的次优化问题就是：举国体制专政了七十多年，予取予夺、天价耗费、扰民不止，还是在不断地警告“动乱”，动辄祭起“亡党亡国”的唬人幡。当然，对于维护一党乃至一人的专政与特权来说，北京至今做的倒是相当的“优化”。而中国人民为此则是牺牲无数，忍受各种劣质治理，为那些无休止的“伟大斗争”而不停地吃苦受累；人们于是常常是怨恨不已，戾气深重。

如同其他许多威权乃至极权国家一样，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不断制造和夸大各种敌人（从阶级敌人、外国间谍到所谓动乱），从而煽动利用各种真真假假的仇恨与恐惧，以役民渔利。挑战一党专政被臆造灌输为等同于动乱无序；要么是一人一党永远专政，要么就是地狱般的无政府大混乱。这种说法既不符合史实，也没有逻辑，还彰显了掌权者的自私与邪恶。他们其实是在威胁和勒索人民：要么唯我独尊，无限特权，要么天下大乱，同归于尽；如果挑战和削弱独裁权力，人们就会失去最基本的社会秩序与公共治安。时间长了，这种漏洞百出的欺人把戏还是形成了许多人脑子里的自欺迷思。

历史与理论都已经充分表明，民主政治并非十全十美，但能够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社会动乱。在民主化进程中，由于人事变更和政治竞争秀，有

许多需要人们适应的新人新事，会令人一时晕眩；也会有人趁机渔利作恶；甚至会有一些停滞倒退，影响到日常生活。这些应该看作是一个伟大民族寻求更好政治制度的不可避免、完全可以容忍、更是可以尽量减少的代价。与非民主政治下长期的根本性次优化、各种运动与折腾，以及经常的悲剧性灾难相比，那真是天壤之别。把21世纪民主化政治转型过程中会有的一时变动与可能的一时不确定，等同于中华世界里过去王朝更替时常见的天下大乱与大血洗，是幼稚可笑的无知想法，更是掌权者阴险的愚民把戏和赌博诡计。其实，到时候更大的可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身家性命与既得利益，养尊处优好几代、密切连接乃至依赖外部世界也已经几十年的中国统治群体不敢、不愿也不能制造大混乱，而为一党一人的独裁专制去自杀殉葬。韩国、台湾、智利和苏联集团诸国的基本和平的政治转型就是明证。法国大革命和德国、日本那样的非要血与火才实现的政治转型，应该早已成为不会同样再现的旧历史了。

统治者的明智与勇气将会决定性地减少民主转型的代价。言论自由、示威抗议、民众结社、司法独立、多党竞争，都是已被证明了的有益铺垫与有效步骤，会动态地维护政治稳定、推进良政与善治。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应该是最终会结束一党专政，但不一定非要“亡”共产党，很可能不会“亡”中华人民共和国，更不会“亡”中国。除了一些权欲熏心而又愚蠢蛮横的掌权者外，绝大多数人，包括统治精英里的绝大部分，都会过得更好、更安全。可能会引发的一些领土变更和政权重组，也许会令一些沙文主义糊涂虫们痛心疾首；但由此对各民族人民的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性持久优化，其实会远远大于可能的暂时性不利与不适。



陈健民 (台湾政治大学社会学系客座教授): 中国人怕乱, 政府更怕。怕贫富悬殊和贪污会引发动乱, 提倡“稳定压倒一切”以保证生存和发展。为了稳定, 不惜取消言论、集会等自由, 不惜以武力镇压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但

中国过去百年的动乱, 是因为有太多或太少的民主? 文革、大跃进、国共内战、中日战争、北伐等造成的生灵涂炭与民主何干? 再追溯历史, 每二、三百年便出现大规模农民起义, 皆因土地过度集中、贫者无立足之地, 专制皇权从来无力阻止这种恶性循环。

不去直面专制造成的动乱, 却对民主变革心存恐惧, 是因为当权者怕失去权力; 但何以民众同样恐慌? 是担心民主政府太过注重个人自由, 造成争论不休, 政府施政受阻, 甚至警察无从执法、个人生命财产蒙受威胁? 抑或担心失去一个独裁的中央, 尾大不掉、诸侯割据、甚至引发内战, 新疆、西藏、台湾、香港独立, 中国从此分崩离析?

怎样才算是乱? 这涉及价值及文化判断。对于崇尚自由民主的人来说, 即使众声喧哗、甚至因为公众参与而牺牲一些行政效率, 那一点“乱”换来的是对多元的尊重和社会共识。如果人们理解到一国的版图往往是战争的结果, 若尊重民族自决, 即使一些地区分裂出去也非天下大乱。何况采取合适的制度设计, 民主亦可以维护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

二次大战后一些新兴民主国家出现严重种族冲突, 甚至最终分裂成不同国家。这是因为西方帝国到非洲、中东和东南亚建立殖民地时, 将不同的部落强制纳入其统治范围内。当这些国家在战后决定结束殖民统治而进行“非殖民地化”时, 往往硬搬宗主国那套民主制度。以英国为例,

其“西敏寺模式”民主强调少数服从多数、单一制、分区单议席单票制选举、两党制、单一政党执政等做法，只适合种族、语言、宗教组成较为单一的社会，而许多殖民地的状况并非如此。

试想一个族群在一新兴国家中只占少数，与其他较大的族群长期处于紧张关系。如果采用英国的民主模式，该族群会成为持久的少数，与其被其他族群以民主之名欺压，倒不如走上分离主义之路。但阿伦特·里杰哈特（Arendt Lijphart）以瑞士、比利时等国家为例，提出以权力分享为原则的“共识型民主”，实行联邦制、联合政府、比例代表制选举等，令少数民族裔的文化、宗教、语言受到保护而最终留在同一主权国家。中国如果成为民主国家而且希望不以暴力维系各个民族，必须采纳部分共识型民主的制度，譬如联邦制和全面下放言语及宗教政策权力至各族群。

至于如何避免民主化带来政局的不稳和管治能力的大幅下降，非一篇短文可以处理。胡安·林茨（Juan J. Linz）和阿尔弗雷德·斯泰潘（Alfred Stepan）有专书讨论民主巩固的问题，他们指出，市场经济、法治、公民社会、政治社会（政党及选举制度）和有效的行政系统，均为巩固及深化民主的社会及制度条件。如果在民主化之前经历一段自由化过程，让上述某些条件得以发展，新生民主的表现会更佳、更能以绩效增加其认受性。如果在这些条件非常薄弱的情况下出现一场革命，民主巩固的难度会更高、更容易出现民主崩溃，回到治与乱的循环。



胡平（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荣誉所长）：匈牙利学者格雷什科维奇在《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学》一书讲到，在预言东欧的政治与经济发展前景这一问题上，专家们有三个

没想到：第一个没想到，是共产主义体制垮得那么快。第二个没想到，是转型导致的经济下滑那么剧烈。第三个没想到，是在转型时衰退那么严重且持续时间那么长的情况下，没出现不少第三世界国家在转型过程中曾出现的那种剧烈动荡的现象，也就是没有乱。

补充一句，蒙古的民主转型也没有乱。其实，苏联的民主化也没有乱。苏联的民主转型是和平的，甚至苏联的解体都是和平的。俄国后来出了问题，出现了严重的民主倒退。那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但至少在先前民主化这一阶段中没有乱。

中国民主化会不会乱不是一个具有必然性的问题，而是一个或然性的问题。中国民主化并不必然会乱，也不必然不会乱。中国民主化会不会乱，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种政治势力用什么态度、什么方式去对待他们面临的问题。如果我们准备的好应对的好，就可以不乱，如果我们准备的不好应对的不好，就很可能乱。这也就是我们现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意义所在：我们现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为了未来更好的实现民主化做好准备。

按照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的说法，民主作为一个整体是由两个不同因素组成的：因素之一是使人民获得自由（自由主义）；因素之二是使人民掌握权力（民主）。这也就是说自由民主包括：一、保护人民，指的是人民免受暴政的压迫；二、人民掌权，指的是建立人民的统治。从程序上说，获得自由和保护人民乃是民主自身的必要条件。因此，保护人民在自由民主的两个因素中乃是不可缺少的、决定性的因素。

回到中国的问题上来，在民主化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应当实现自由，首先

是言论自由。

应该看到，对中国这样的共产国家，自由与民主的关系还要更简单些。因为就连中国现行的宪法也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须由人民选举产生。但是在中国，这种选举之所以沦为假选举，就是因为没有言论自由，不允许发表不同政见。这也就是说，一旦有了言论自由，中国宪法上规定的民主就被激活了，假选举就成了真选举。这也就是说，在中国，赢得了言论自由也就是赢得了民主。

当然，在中国的现行宪法中，有关民主的条款还有别的很多问题。按照这部宪法，只有县区级人民代表才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省市级和国家级的人民代表都是间接选举产生。在未来中国的民主化过程中，这些都是需要改革的。只是这些改革可以逐步推行，不一定非要一步到位。包括修宪制宪，都免不了会有个过程。从优先顺序而言，我们应当把言论自由置于首位，并且把它夯实。这样，即便在下一步民主化进程中出现困难，甚至出现某种倒退，我们起码还能站在言论自由这块坚实的基石之上，而不至于一退就退回到暴政。

在未来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中，我们必须慎重对待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族群问题，是分离主义或曰统独问题。正如戴雅门(Larry Diamond)教授所说，族群是民主政治中最重要、最常见且可能最具破坏性的割裂之一。族群身份是政治制度中的一种割裂因素，是一种聚合型的割裂，并且极有可能造成感情用事、政治认同激化、甚至暴力。族群冲突很容易导致零和的结局。回顾苏联东欧国家的民主转型可以发现，那些出现了动乱的国家，十之八九是统独之争引起的，俄国的民主倒退和强人崛起也是借助于镇压分离主义而形成的。

可见这个问题对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性。关于这个问题，我在《要得公道打个颠倒——中国民族问题与民主转型》一书里有详细论述，这里就不重复了。



宋永毅（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讨论中国的民主化转型是否会引起社会的动荡和内乱，我认为必须首先大致地界定什么是令人忧心忡忡的“动荡”和“内乱”。

民主化后的中国或许很快出现这样的“乱象”：一是雨后春笋般的新政党喷发，民众和媒体都会习惯于对执政者指手划脚，乃至游行示威都成了家常便饭。二是在选举中会出现整个社会的意见分裂，甚至“水火不容”，非得通过“数人头”的投票才能解决。三是选举后的议会里会出现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的不断互相攻讦，甚至偶尔发生不雅观的“肢体冲突”，造成决策的效率缓慢。如果有人担心这些为不可接受的动荡和“内乱”，那就是杞人忧天了。一个民主社会必然是一个众声喧哗的多元社会，而社会的意见分裂有时也确实只有通过投票得出的多数来决定。但是，“数人头”（民主选举）绝对要好于“砍人头”（诸如阶级斗争和政治迫害后达到的专制），因为它不会造成流血和最宝贵的生命的丧失，使最终的和平“妥协”成为可能。有人说专制政治的特点是“你死我活”，而民主政治则建立在“你活我也活”的基础上，这是很有道理的。简言之，一个允许不同观点和利益进行纷争的多元社会才是政治代价最小的、活跃的社会。

如果把“动荡”和“内乱”的内涵定位于饥荒人祸、兵凶战危，或许会比较准确一些。因为这些确实会造成人类社会的极度灾难。但纵观已经过去的二十世纪的历史，我们却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大都发端于专制极权的

国家。在二十世纪有记录的140场战争中（维基百科），规模最大、伤亡最重的战争，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都是由专制国家制造的。尤其是自1917年俄国建立了苏维埃后，在“革命”的旗帜下，共产党至少在近二十多个国家进行了内战，在血泊中建立残暴的红色帝国。前者如中国这样的大国，杀掉了上千万人。后者如柬埔寨这样仅七百万人口的国家，竟也被红色高棉杀戮了近四分之一的人口！

论及人祸，大饥荒应当仁不让。在上世纪的数十次大饥荒中，共产专制的苏联1930年代和中国1960年代的大饥荒被排在首位。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饥荒研究专家阿马蒂亚·森认为：绝大多数饥荒的起因，不仅是因为粮食减产，通常结合着对于问题严重程度认识的匮乏甚至是被有意的误导。他认为全世界历史上，民主正常运作的国家从来不会发生饥荒。而当时的中国在毛泽东的经济政策每年饿死百万计人口的情况下，却没有在议会或者报纸出现批评的声音。因为缺乏反对党和新闻自由，经济政策持续三年而没有得到校正，从而造成了现代社会最大规模的饥荒。从历史的纵横中观照民主和专制政权：哪一个更会导致动荡和内乱，应当是一目了然的。

坚真光（笔名，中国大陆社会学副教授）：民主化是从集权向分权转变的社会变迁，社会变迁无疑会引起人们的适应问题。民主化会带来包括生理、认知、行为和结构等诸多方面的变化和与之相应的适应问题。人们能否接受和适应民主化带来的诸多变化，将影响个体、社会和制度的互动关系，进而影响社会秩序和民主化进程。

民主化有可能在短期内对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条件、生活质量和社会安

全产生负面影响；民主化要求民众具备与民主相适应的认知模式和水平；民主化需要民众积极、理性、有序参与民主政治的行为方式和能力；民主化必定会导致政治、经济和社会等诸多结构性变化。这些变化和要求对民众的生理适应、认知适应、行为适应和结构适应提出严峻挑战。

如果人们在民主化过程中无法或难以理解、接受和适应这四个方面的变化，就可能出现激进民主化或逆民主化的行为反应，进而导致社会动荡和民主倒退。

那么，哪些因素影响人们在民主化进程中的四个适应呢？

一是与民主化相伴随的生活质量改变；二是与民主化所要求的认知水平和行为能力与国民实际认知水平和行为能力的差距；三是民主化进程带来的结构变化的广度、深度与速度；四是内部精英和外部势力对民主化的干预方向与程度。最后一个因素至关重要，它对四个方面的适应产生直接且重大的影响。

针对影响民主化适应的几个因素，结合中国民主化所经历的成败得失，借鉴新兴民主国家的经验，我认为中国民主化大概率不会引起激烈的社会动荡。

首先，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物质财富，使人们的生活水平大为提高。即使近十年来逆改革开放的“骚”操作，对经济发展造成巨大伤害，但一旦中国民主化，就会重启改革开放，发达经济体也会重新对中国包容和开放，将迎来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促进人们民主化的生理适应。其次，30多年改革开放与全球化、信息化相伴而行，使越来越多的人接

触、认识、理解和接受民主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为中国民主化奠定了较为广泛而厚实的思想启蒙和行为学习的基础。尽管近十年来政府不遗余力的反启蒙对民主化造成不利影响，但这种影响仅限于认知能力不足的中下层民众。而近年来的极权化和由此导致的经济衰退，反而有助于社会精英的民主启蒙，使人们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到专制的危害和民主的好处。再次，中国是民主化的后进生，经历多次民主化失败，有国内外民主化的丰富经验和教训可资借鉴，在一定程度上可避免重蹈他国和本国激进民主化的覆辙，不会出现过广过快的民主化，这有利于人们对民主化的结构适应。最后，国内精英和外部势力会形成推进中国民主化的合力，为中国民主化提供正向扶持、引导、约束和推动。近十年来，无论是中国的政治精英、知识精英还是经济精英，都经历或正在经历高度极权的“洗礼”，痛定思痛，他们应该会达成中国必须民主化的共识；在国际社会，民主化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民主阵容日益壮大和联合，而以俄罗斯等国家为轴心的专制阵容日趋衰微与神离，已经很难对中国民主化进行逆向干预；民主国家已经感受到日益强大的中国专制政权的渗透和威胁，出于自身安全与繁荣的考量，他们也希望中国早日实现民主化，中国民主化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公共问题。一旦中国启动民主化，国际民主阵容一定会进行积极的正向干预。

中国民主化如同以色列人出埃及，要经受生理适应、认知适应、行为适应和结构适应等诸多重大挑战，道路必定曲折艰辛，但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李西潭(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1989年天安门屠杀以后的中共，只着重在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并未推动任何政治改革。习近平上台以后，运用高科技控制人民，数字极权主义隐然成形，并对外采取扩张政策。在这

后疫情时代，全球担忧中共会不会对外发动战争的同时，也开始关注极权专制政体会不会崩溃垮台？进而思索若中国推动民主化，能否维持政治稳定。

首先，如何看待民主、专制与稳定的关系？研究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与民主化的理论大师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于1968年出版《转变中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政党竞争从长远来看，除了促进民主外，更可增进政治安定。他说：“我们经常以促进民主、建立负责任的政府及维持多数统治为理由，来为政党竞争辩护。但我们也可用政治安定的价值，来证明政党竞争的必要性。政党竞相争取选民支持，一方面可以扩大政治参与，同时也可强化政党组织。再者，此种竞争可诱使怀有政治意义和政治愿望的新社会势力，较可能在体系中求发展，而不是与体系作对。”

其次，以台湾的政治发展为例来观察，发现愈民主就愈稳定，也愈少暴力。戒严时期无论是白色恐怖，或者1977年中坆事件、1979年“美丽岛事件”，都比1987年解严后更多暴力。1987年到1996年民主转型期间，虽然集会、游行等抗议活动频繁，但唯一暴力案例为1989年郑南榕被迫引火自焚。而1996年举行首次总统直选、确立为主权在民的自由民主国家，完成民主转型以后到现在，台湾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政治暴力事件。以2014年“太阳花学运”为例，长达二十三天，相对和平、没有人死亡，五十万人上街集会游行离开以后，垃圾三十分钟收拾干净，展现公民社会运动的高素质。亨廷顿指出，第三波民主化的特征之一就是非暴力，台湾的民主转型更普遍被赞誉为“宁静革命”。

反观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被反过来用作对内镇压与对外扩

张的工具，乃是世界上唯一维稳经费超过国防开支的国家。但为何需要这么多经费来维稳，岂不代表极权专制严密控制下的社会反而极度不稳定？未来中国民主化稳定与否，吾人认为下列五项因素非常重要：1、建立制度化，尤其是确立宪政主义（constitutionalism）的精神。2、尊重地方自治与联合国两大国际人权公约共同承认的第一条“所有人民都拥有自决权”原则。3、确保军、警、情治人员服从民选领袖的领导。4、透过民主化来培养人民的民主文化素养。5、组建全球自由民主联盟来帮助中国人推动民主化的进程，以免重蹈俄罗斯转型未能成功的覆辙。

雷乐天（中国大陆政治学者）：中共的“民主致乱”论浮现于1989年左右。1980年代的民主运动中，在1940年代加入中共或加入其外围组织的老党员，如方励之、王若水、鲍彤、杜光、郭罗基、江平等，堪称中流砥柱。他们青年时代不满国民党独裁统治，向往中共对民主的许诺。笑蜀《历史的先声》已颇为详尽，在此不赘。中共改革派不是改革开放后的新生事物，而是一个对自由民主信念始终如一的群体。同样搞学潮起家的江泽民等另一批中共党员则背离了初衷。

李鹏和邓小平都表达过“民主致乱”论，称镇压八九民运是为避免另一场文革。1966、1967年确实出现了194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用毛泽东给江青的信中的话说，“天下大乱”。“天下大乱”无疑是“乱”，但是“民主”吗？

按中共官方宣传口径，中国现在是“全过程人民民主”，虽然跟自由民主不同，但也是一种民主。既然中国已经是民主了，怎么还没乱呢？其实这种“民主相对论”经不起任何推敲。照此逻辑，为破除西方对民主的“话

语霸权”，沙特阿拉伯是“君主专制式民主”、伊朗是“神权式民主”、大清国是“爱新觉罗式民主”……因此，为了避免讨论的混乱，必须将民主明确定义为自由民主。

“天下大乱”时集会、结社、游行、示威一应俱全，充其量是“毛式民主”，并非自由民主。从红八月到广西文革屠杀，抄家、武斗、私刑、拘禁屡见不鲜、“无法无天”，对公民权利的保障沦为一张空文。自由民主的要义是对民主加以“自由”的节制，意味着对生命、财产、自由等人权的法律保障先于任何形式的民主，无论是代议制选举、直接选举还是参与式民主。惟有如此，才能防止民粹主义乃至暴民政治。如果将“民主致乱”理解为“毛式民主”会导致“天下大乱”，此言不虚。但1980年代以来，中国民主运动的清晰诉求是自由民主。将自由民主与“毛式民主”混为一谈，用“稳定压倒一切”将两者视同，不啻为一种话语操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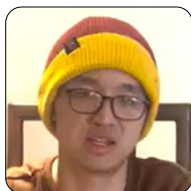
民主转型未必一蹴而就。担心向完全的自由民主（如日本、韩国、台湾）转型风险太大，向混合政权即有限的自由民主（如新加坡、香港）转型，也不失为一定程度、一个阶段的中国民主转型。无论何种程度和阶段，一场不可逆的民主化（democratization）必须经历成功的民主巩固（democratic consolidation）并避免民主倒退（democratic backsliding/autocratization）。“60年代人”戈尔巴乔夫以推动民主化名载史册，但这场民主化以民主巩固失败及接踵而至的民主倒退告终，这是戈氏本人及俄国的遗憾。笔者相信，中国民主化的21世纪伟业离不开“白纸一代”政治新人的智慧和勇气。

祢正平（旅美中国留学生）：“中国民主化后会乱吗”，这个问题直到中共政府倒台之后才会有答案。我不是诸葛亮怎么能预测未发生的事呢？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其实是关于“中国人愿不愿实行民主，有没有能力实行民主”的讨论。持否定态度的人大多是文化决定论者。他们认为中国几千年大一统的历史传统、忠孝节义的儒家文化使得中国人无法实践源自西方的这一政治制度。所以，即使中共政府倒台、民主制度建立之后，中国人也会选择另一个独裁者作为领导人，最后重新令这个国家、乃至世界陷入混乱。持肯定态度的人则大多是制度决定论者。他们认为施行民主制度后，中国人获得了言论自由和投票等权利，能够收到不同的信息，自然就会摒除国家主义等思想，选择坚持民主制度并代表他们利益的领导人。

但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偏颇之处。对于文化决定论者来说，似乎每个人一出生便获得了一个无法更改的“出厂设置”。不过这却无法解释他们自己作为在中国那片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人，为什么会选择支持民主制度；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欧美台日等成熟的民主国家内，依然有白人至上主义者、法西斯与支持中共统治的坦克党（tankie）。而对于制度决定论者来说，似乎民主是一剂万灵药，只要中共倒台，施行民主派制定的宪法与转型正义方案，一切问题便会迎刃而解。可是即使在成熟的民主国家内部，各种矛盾依然存在甚至很尖锐，现在更是面临着威权、保守主义回潮的威胁（必须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是说民主制度不行。相反，我觉得只有一人一票、分权制衡的宪政民主才能称之为民主，也只有宪政民主才能真正保障公民权利）。

那么，到底是什么决定了中国人愿不愿、有没有能力实行民主呢？在这里，我曾向胡平先生请教一个问题：民主墙、民刊一代成长于文革时期，信息极度闭塞，连书都没有几本，他们的自由民主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他的回答是过去痛苦的经验。正是因为经历了那个疯狂的年代，受到或看到了非人道的迫害，一些人开始反省，有了或朦胧或清晰的自由民主思想，乃至开始了追求自由民主的行动。所以，决定中国民主化后会不会乱、有没有意愿和能力实行民主的其实正是中国人自己。如果我们自己能一代代保存痛苦的记忆，能反思极权统治与自身所享受的特权，能看到并积极回应所有受压迫者的诉求，那么一个民主自由、多元包容的社会就会最终建立。



王涵（旅美中国留学生）：“中国民主了会乱吗？”，这的确是很多人经常会问，很多威权主义者在反对中国民主时都说一定会乱，我听到都有些烦了。

首先，民主自由本就是天赋人权，与民主之后发生什么结果并没有关系，民主本身就是目的。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在西方文明史发展的几百年历史上，革命发生时，英勇的人民并没有想到革命之后的政府会不会“乱”，会不会因为持续的争论导致政府效率低下，会不会因为地方和中央冲突而导致战争。当时人们想的仅仅是民主本身作为议事程序，就可以作为追求的目标，不论其带来的结果和影响如何。政府、国家作为一个共同体，其本身就应该保证人民拥有参政议政，选出自己领导人的权利。这种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为每个人都应该相信，不管人生来经济上有多大差距，他们在社会上拥有的权利应该是相等的。反民主的专制体制名不正言不顺，本身就站在了正义的

对立面上。

其次，民主之后所谓的“乱”，并不是很多人想象的血流成河战争，更多的是关于各自立场和利益的激烈争论。历史上激烈的讨论无一不促成了相关领域伟大进步，美国总统辩论促使普通民众对国家政策有更深入的理解，战国时期庄子和惠子“子非鱼”的辩论促进了哲学的思考，波尔和爱因斯坦的争论促成了量子力学在物理学的进步。其大部分结果都是正面的。中国历史上，文化和思想最繁荣的时代正是春秋战国的分裂时代，所谓“乱”的时代；而中国历史上最落后的时代，反而是固步自封的皇权专制王朝的顶峰清朝，所谓最“不乱”的时代。衡量文明与否的标准和乱不乱并没有关系，而是文明本身所创造的成就。反过来讲，威权专制就能避免所谓的“乱”吗，纵观中国历史，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每隔两三百年就更替一次，而每次更替，中国土地上就会人口锐减、生灵涂炭，而中国历史并没有民主启蒙。

最后，民主本身会带来真正的和谐，就如一个家庭一样。一个家长制的父权家庭往往会造成矛盾的积压不可调和，而真正地民主讨论反而会造成家庭的成员拥有主人翁意识，从而家庭更加和谐。国家也一样，因为人类社会处处存在矛盾，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与其用强力压制讨论，不如暴露矛盾，让真理越辩越明。而专制社会下掩盖矛盾、镇压异见、暗箱操作，这必然激化矛盾，造成暗流涌动，直至民怨沸腾。

对于每个理想主义者来说，民主都是不可妥协的原则，而对于每个现实主义者来说，民主都是国家走向文明的必要条件。综上，民主会不会乱结论似乎不言自明了。



邓聿文（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前副编审）：中国经济遇到了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困难，对民主转型来说，这将提供一个有利时机。尽管经济的变坏并不一定会促使民主化的到来，然而，经济处于困难阶段，显然比经济处于上升阶段更让人心思变。所以，对有志于促进中国民主变革的人士，必须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之窗。

从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看，人们对现状，对习近平的统治是越来越不满了。我认为这种不满的社会情绪已到了某种临界点。虽然人们基于各种考量，还不敢公开走向街头表达对政权的不满，但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知道目前这种情况不可能维持太久——要么变好，要么变得更坏。可习近平的十年统治已经耗损了中国的发展元气，变好的概率很小，变坏的概率却很高。

尽管如此，民主化不会自动到来，需要有人去催、去鼓动，让更多的民众放下心理包袱——其中一个影响人们参与民主化的心理包袱，就是担忧社会不稳，天下大乱。中国民众此种“求稳怕乱”心理既来自于历史经验，三千多年的中国历史打仗的时候多，和平的时候少，形成了所谓“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的心理认知；更来自于当局对民主革命的妖魔化宣传洗脑，特别是对个别国家在民主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战乱和暴力现象，把它歪曲为民主化的普遍现象，以此恐吓大众。

一些国家在民主化中出现一定程度的内乱和暴力，是有自身的特定因素，可并不表示所有的民主转型都会经历这个过程。比如，苏联的解体就是一种相当和平的态势进行，作为一个靠武力起家并严重依赖暴力镇压功能

的帝国，它的解体过程没有出现流血，此后社会也未陷入内乱。东欧国家的民主化也没有出现内乱。世界其他地区其民主转型多数也是平和的。因此，把民主化和动乱、暴力、战争等挂起钩来，认为是国家民主转型的必然现象或者普遍规律，是错误的，乃中共多年来为维护一党专制统治而编造的宣传伎俩。

中国和苏联一样，都有着很长的专制历史，又都在共产党的暴力统治下；既然苏联的转型是和平的，就不必成天担忧中国的民主转型一定会如此。当然，有人会反驳，苏联的民主化其代价就是一个强大帝国的解体，怎能保证中国在民主化中不会分裂？确实不能保证，甚至也不能保证中国就一定不会出现动乱，事情在未做之前任何可能性都有。但是，不能怕这怕那就不敢去尝试。打个比方，不能因为怕出车祸就不去开车。如果这样，恰恰中了中共的圈套，它就希望人民谨小慎微，好永久统治。

政权更替免不了是有代价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使每个人在民主化中代价尽量地少，在每个人的可承受范围内。不过，话也说过来，在一个政权气数已尽时，不会因为人们怕乱它就不会崩溃。所以，对大众来说，既然想变革，让自己从此不再生活在中共统治的恐惧中，就不该被它的宣传所惑，而参与到民主变革的事业中来。